

「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 香港研究系列

II. 廣東與香港

楊汝萬 沈建法 紀緯紋

香港亞太研究所

「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研究系列

II. 廣東與香港

楊汝萬

沈建法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楊汝萬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及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

沈建法為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紀緯紋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

© 楊汝萬、沈建法、紀緯紋 2007

ISBN 978-962-441-190-4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研究系列

II. 廣東與香港

持續演變的粵港關係

廣東與香港的關係源遠流長，政治、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關係千絲萬縷，為粵港關係構成了複雜而緊密的網絡。也許1841年香港的割讓、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1950年代初聯合國對中國的禁運等一系列大事，曾使粵港關係有所起伏；但兩地之間的連繫從沒割斷；反之，香港的特殊地理區位和與國家持續不斷的關係，卻曾為中國的發展和對外關係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及至1978年國家改革開放，廣東成為經濟改革的排頭兵，它多年來善用香港的資金和網絡，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加上1997年香港回歸後最新一輪粵港互動下，粵港關係更踏上了新台階。經過近30年的急速發展，粵港的關係更加緊密，無論是從合作範疇的廣度還是合作層次的深度看，均是前所未有的成功。當中港粵「前店後廠」的發展模式更為世人所稱道，是推動粵港兩地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主要動力之一。

然而，粵港關係雖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面前的挑戰也日益增多加劇。全球化、區域化浪潮對各地經濟活動、經濟和行政結構、城市空間所產生的影響、對每個參與競爭的經濟體系的新要求等變化，成為影響粵港未來發展的外在因素。香港作為世界金融和商貿中心之一，以及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作為「世界工廠」，自然難免被世界生產、貿易、消費等經濟潮流所影響，但粵港兩地也同時發揮影響世界之作用（如在珠三角生產的某類貨品的出口量減少，能衝擊世界上該個產業的

經銷，造成連鎖影響）。在區域經濟上，粵港兩地不單面對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挑戰，更要接受國內長三角、環渤海等經濟區域競爭的事實，需要作出及時和適當的回應。世界如何改變粵港關係、粵港如何調整功能與角色去回應世界，絕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內在因素方面，經過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不論是香港還是廣東在經濟和社會的水平和結構已產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並將跨越一個更大改變的階段。簡單來說，香港本土內工業活動早已式微，轉變為服務產業主導香港經濟，並力圖向後工業時代的知識型經濟發展。而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的落實，不單在人心上，在行政結構和政治管理上亦影響著粵港關係，以及兩地之間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互動發展。至於廣東，高速的發展使其經濟走出純以勞動密集為主的初級工業化階段，轉向以重工業、高新科技為主導的高度工業化階段及服務產業（Liang, You and Kee, forthcoming）；廣東的整體經濟表現連年大幅提升，並已在2003年超越香港。¹此外，受到上述內外因素的推動，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得以促成，不單香港的商機有所增加，廣東亦可加強向外投資的力度和大力擴張對外經濟的規模。在此新格局之下，「前店後廠」的關係可否維持受到考驗；為此，有言論倡議以「新前店後廠」關係來取代舊有模式、甚或揚言粵港已經步入「新前店後廠」年代（朱文暉、張玉斌，2004；《深圳特區報》，2005）。粵港關係如何推進、香港如何保持其獨特性和對廣東發揮其特殊作用已成為兩地重要課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首個五年計劃——第十個五年計劃（「十五」）經已圓滿結束，進入另外一個關鍵的五年——「十一五」時期。關乎粵港發展的內外因素的變化將更多更快，廣東計劃更大幅度的革新、飛躍；香港則在邊緣化的陰影下積極保持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多項「中心功能」。粵港雙方仍在摸索、調整與對方的關係和自身的發展戰略。世界上不乏跨界區域發展的案例，除了歐盟、東盟等超越國家的合作外，次國家級（sub-national）的區域合作有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各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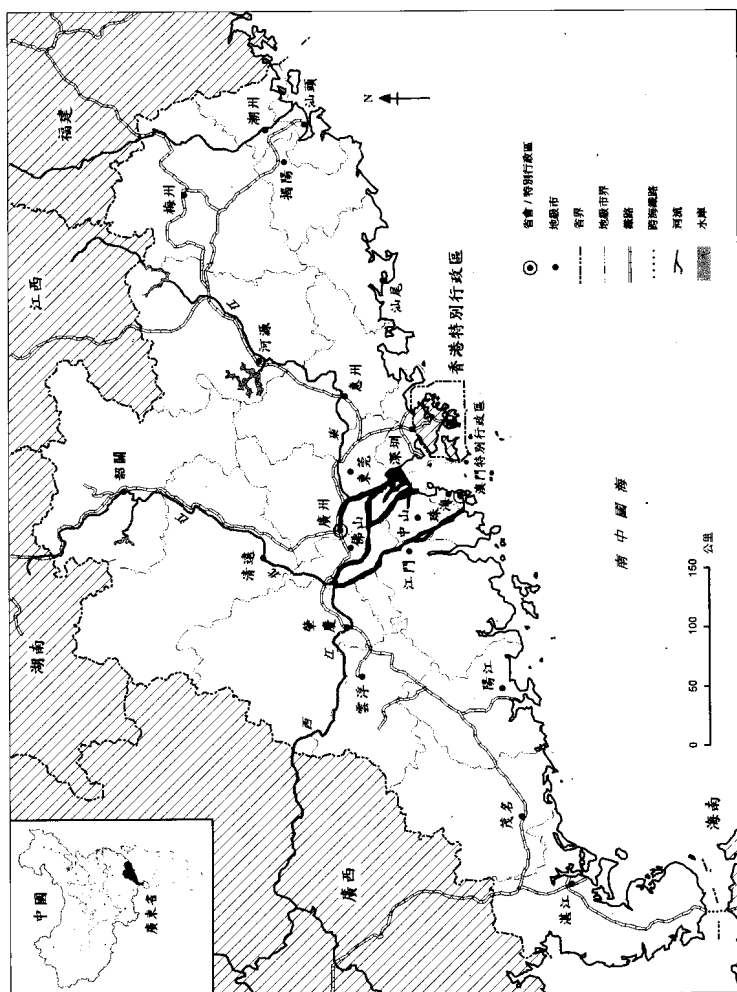
區域發展；歐洲荷蘭的蘭斯塔德區域（Randstad）的形成，及它與荷蘭其餘地方及歐洲地區的往來關係；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經濟增長三角（SIJORI Growth Triangle）等。粵港的發展大可借鏡這些地區發展經驗和當中的實施理論、概念框架之長，按自身實情加以調節運用。

因此，在新的全球、區域和內部發展形勢下，如何理順、經營新的粵港關係，推動粵港的共同發展走上新台階，將是本文嘗試解答的問題。當中可分兩部分進行研究。首先是在經濟活動上。廣東從過去承接自香港移來的輕工業/製造業，向目前以自身優勢為起點的重工業、石化、高新科技工業推進，廣東是否仍需要香港的參與，以及香港能如何參與這些非香港傳統工業的發展，是首個有待解答的問題。兩地企業的參與固然重要，而政府的角色和積極的政策將有助兩地不同產業的交流和互動發展。另一部分是關注香港和廣東在空間區位上的演變和結合。兩地對城市應有功能的定位、會產生怎樣的互補和競爭，將大大影響粵港關係的發展。總結上述兩個研究部分，可望反映出廣東和香港在大珠三角發展上角色的改變，並預期兩地在泛珠三角合作中能擔當甚麼角色，應作怎樣的規劃。

廣東經濟和社會發展現況

廣東作為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排頭兵將近30年，其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居於領先地位，在全國佔有重要的份額，如廣東的財稅總收入佔全國的七分之一、累計實際利用外資佔全國的四分之一等，與其不成比例的土地面積（不足全國的2%；圖一）和生產力比較，廣東對中國近代發展的貢獻是難以替代的。多年來，蓬勃的工業生產活動為廣東的總體經濟實力作出了重大貢獻。當中地區生產總值（GDP）的變化是最明顯的指標——從1978年改革開放時的185.85億元人民幣，² 大幅增加至2005年的22,366.54億元（廣東省統計局，2006:91），1979至2005年的每年平均增幅達到13.7%（表一）。在2000年

圖一：廣東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位置



即「九五」計劃之末，廣東成為全國首個GDP超越一萬億元的省分；而在2005年即「十五」計劃終結之年，廣東再次成為全國首個GDP突破二萬億元的省分。蓬勃的工業生產活動有力地牽引廣東工業成長，不斷步向新階段。全省工業總產值在2005年達到了41,661.74億元，1979至2005年的每年平均增幅逾20%；2001至2005年的每年平均增幅更達到21.1%。全省的工業發展逐步形成了九大工業產業，該九大工業產業在全省的工業增加值上佔有主導性的比重，對廣東經濟有重大貢獻。

縱使「十五」期內的五年，廣東GDP的每年平均增幅仍能保持在13.2%的高水平，並較預期的9%高出4.2%（廣東省統計局，2006:16），但增長模式落伍，及所付出的代價依然困擾著廣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三高一低）仍普遍見於廣東的生產活動（廣東省統計局，2006:20）。不斷增加的生產成本卻換來持續下降的投資效益，對廠家和投資者來說並非有利的營商條件；各種能源和生產資源的持續高投入，不單令資源已嚴重短缺的廣東百上加斤，更無助省政府達成減少每單位能源消耗和改善環境的目標。省內縱有城市得到綠色城市美譽，但工廠、汽車所產生的廢料、污水、煙霧依舊是不少城市的積患。這對廣東的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人民的生活，將帶來極大和深遠的負面影響。如何在降低資源投入和減少消耗下，保持甚至提高生產效益和生產總值，將成為廣東在「十一五」時期工業發展的關鍵。

在廣東龐大的工業生產活動中，有很大比重是屬於外來資金和出口生產活動，這可以從進出口數字和外商直接投資數字得到引證。2005年，廣東的進出口總額達到4,280億美元（表一），當中出口額便高達2,381.7億美元（廣東省統計局，2006:63）。外商直接投資亦從2004年較低的數額中復甦，上升至2005年的123.6億美元，五年累計總額達643.5億美元（黃華華，2006）。折算後，³ 2005年，廣東省的外貿依存度和外資依存度分別為156.75%和4.53%，兩項數據均較全國（分別為63.86%和2.70%）為高。⁴ 當中，香港是最大的外來資金

表一：廣東省主要年分重要統計指標

	1978	1990	2000	2005	年均增長	
					1979-2005	2001-2005
年底常住人口(百萬人)	50.64	63.47	86.50	91.94	2.2%	1.2%
GDP(當年價,十億)	18.59	155.90	1074.13	2236.65	13.7%	13.2%
人均GDP(元)	370	2484	12736	24438	11.2%	11.4%
工業總產值(十億)	20.66	190.23	1690.45	4166.17	20.9%	21.1%
海關進出口總額(十億美元)	—	41.90	170.11	428.00	—	20.3%
其中：出口額(十億美元)	—	22.22	91.92	238.17	—	21.0%
外商直接投資(十億美元)	—	1.46	12.24	12.36	—	—
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十億)	7.99	66.74	437.98	788.26	18.5%	12.5%
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十億)	1.76	75.22	866.73	1905.14	29.5%	17.1%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十億)	4.18	13.10	91.06	180.72	—	—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十億)	2.72	38.15	323.37	716.41	22.9%	17.2%

資源來源：廣東省統計局(2006:58-65)。

來源，雖然近年來在比例上有所下降（2005年為47.10%），但1979至2005年的累計投資額還是相當巨大，佔廣東外來投資的64.74%（廣東省統計局，2006:514）。香港在外來資本貢獻上、生產鏈演變上、外資空間分布上都深深影響著廣東的經濟和城市發展，並已成為不少中國學者的研究案例（Chen, 1994, 2001; Sung et al., 1995; Chen and Lee, 1998; Shen et al., 2000; Shen, 2002; Shen, Feng and Wong, 2006）。

在同期，廣東常住人口平均增幅只有2.2%，GDP的高增長為廣東的人均GDP帶來了快速的抬升，從1978年平均每人只有370元的生產值，大幅上揚至2005年的24,438元，在未扣除通脹下增幅超過65倍（表一）。伴隨著人均GDP的上升，是城鎮及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在「十五」期內平均每年分別增加8.6%和5.1%（廣東省統計局，2006:65）。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亦同時擴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2000年的2.67：1擴闊至2005年的3.15：1（廣東省統計局，2006:21），貧富懸殊成為省政府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否則必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差距日見明顯，但總體居民經濟能力的增強仍然在消費和儲蓄兩方面的增長上有所表現。2005年，全省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到7,882.6億元，過去五年平均每年消費增加12.5%；居民的儲蓄能力更強勁，2005年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19,051.4億元，是五年前的1.2倍之多。熾熱的經濟活動同樣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2005年的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1,807.2億元；而有利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則高達7,164.1億元（表一）。

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類近，外省民工在粵的薪金水平多年持續偏低亦值得關注。縱使省政府已數次提高民工的最低薪金水平，但近兩年春節過後珠三角工廠勞工短缺情況卻日漸嚴重。雖有指這是珠三角產業結構調整所引致的問題，但這些基層勞動力的薪金水平和福利不及長三角地區亦是不爭的事實；而且薪金上升幅度亦趕不上當地物價上升幅度，民工實

質收入反而減少了。這情況既不利珠三角地區內民工和當地人民共處，影響社會和諧發展，亦減弱了珠三角地區對外省勞動力的吸引，影響正常生產活動。

縱然面對勞動力不足的挑戰，廣東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依然強勢發展，並促成了廣東三次產業結構的較大幅度調整。在「九五」期末，三次產業比例為9.18：46.54：44.27；經過五年九大工業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大力開發，第二產業的比重進一步加強，形成2005年的三次產業結構為6.24：50.70：43.06（表二）。但數據反映出第三產業的比例下降，研究分析指出第三產業雖然得到優化，但發展變得緩慢；當中的金融業亦面對經濟總額大、但增加值小，並較上海和「九五」時期為差的問題（廣東省統計局，2006:20），資金的營運效率和效益成為關注焦點。但廣東整體趨勢還是加快產業結構向集群化、特色化方向發展（黃華華，2006），不單加強了部分產業、行業的發展勢頭，其影響亦牽動不少鄉鎮和城市的發展方向和建設。

省內不少城市在工業化發展上均採取集群化、專業化的路向，按著本身的背景、基礎和優勢，選擇特定產業作重點培養和協調業界發展。當中難免有部分產業重複見於不同城市，形成一定程度的惡性競爭，但總體來說，每個城市仍能創造出自身品牌，成功形成主要產業集聚，如深圳及東莞的電子和電腦零部件業、廣州的汽車業、順德的家電業，和中山的燈飾業等（Enright et al., 2003:46）。產業集群化、專業化並不止於城

表二：主要年分廣東三次產業結構（%）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1978	29.76	46.61	23.63
1990	24.67	39.50	35.83
2000	9.18	46.54	44.27
2005	6.24	50.70	43.06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2006:91）。

市層面，更深入到鄉鎮的領域。當中知名的「一鎮一品」發展模式便可見於中山和佛山，如古鎮的燈飾工業、大涌鎮的木製傢具業、黃圃鎮的食品業、陳村鎮的花卉和園藝業等（Yeung, Shen and Zhang, 2005:31, 39, 44），不少專業鎮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這些城鎮的工業化進程和重點產業的成功開拓發展，大大提升了當地的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不少鄉鎮或縣的GDP可高於部分經濟發展較慢省區的一個地級市；而一個地級市（如東莞、佛山）的GDP亦抵得上不少西部省區。繁榮的經濟為城市建設帶來了充足的動力和財政上的支持。廣東全省在基本建設投資上屢創新高，近年的增幅更是驚人。單在2005年，全省的固定資產投資便高達7,164.11億元，當中基本建設投資額為3,660.98億元、房地產開發為1,591.90億元，分別佔51.10%和22.22%；而整個「十五」期間三項數字更分別達到25,727.31億元、10,651.23億元和6,268.85億元（廣東省統計局, 2006:168）。交通、能源和商品房的建設和供應，是這些固定資產投資裏最大的投資項目。「十五」期間的基本設施投資額佔了7,616.41億元（廣東省統計局, 2006:173）。在交通建設方面，全省新增了1,954公里高速公路（並接通省內全部21個地級市和陸路相連省區）、新增414公里鐵路、整治內河航道648公里；廣州新白雲機場在2004年投入使用；廣州港、深圳港等港口泊位及設施大幅增加（黃華華, 2006）。在能源方面，有「西電東送」輸電網絡重點工程提早竣工、核電站的建設和新站前期工作、LNG和石化項目的發展等（黃華華, 2006；楊汝萬、紀緯紋, 2006）。在房地產方面，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和銷售額亦創出近年新高，2005年的銷售面積達到5,038.91萬平方米，銷售額為2,238.66億元，其中住宅佔去1,886.39億元（廣東省統計局, 2006:187）。交通網絡的完善大幅提升了各項生產要素的流動，更充沛的能源供應則提高了對省內正常生產活動的保障；房地產的熾熱一方面反映了城市的開發、更新的速度，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部分人士的經濟能力和社會經濟活動結構的演變。

廣東城市的發展固然觸目，而縣域、農村的經濟同樣有突破性發展。過去數年，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和支援農村發展的支出上都有明顯的增加，農民一方面不用再繳交農業稅，另一方面農村的基礎設施也得到大幅改善。此外，農業結構得到進一步調整，產業化進程加快，同時形成不少農業龍頭企業（黃華華，2006）。此外，三農問題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官、商、學界均就如何改善農民收入、加速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了大量討論和實際工作。發展成績縱然突出，但並不等於根深柢固的三農問題得到完全解決。從地理空間分布觀察，廣受關注的縣域和農村經濟問題明顯集中於廣東的山區和東西兩翼位置。目前，山區和東西兩翼在經濟實力上與珠三角仍有較大差距，如山區和東西兩翼在2005年的GDP只佔全省兩成（表三），⁵與這些地區佔全省七成土地面積和五成人口的比例有明顯的差異。此外，山區和東西兩翼三次產業結構為20：43：37，第一產業仍然佔了很大的比重，與珠三角地區的3：51：46相比，反映出山區和東西兩翼在經濟結構上階段性的落後，當地的工業化程度及工業和服務業對當地經濟的貢獻有待提升。在數字以外，山區和東西兩翼各市各縣的發展策略同樣產生令人關注的問題，這包括市、縣之間在重點產業上的類同而

表三：珠三角與山區及東西兩翼比較，2005

	珠三角	佔全省 比例	山區及東西 兩翼	佔全省 比例	全省總和
面積(千平方米)	54682	30.70%	123453	69.30%	178135
常住人口(萬人)	4547.14	49.46%	4646.85	50.54%	9193.99 ¹
GDP(億元)	18244.47	79.42%	4728.12	20.58%	22972.59 ²
三次產業結構	3:51:46	—	20:43:37	—	—

注：為方便計算，珠三角數字為珠三角九市之總數，山區及東西兩翼為其餘12市之總數。

1. 實際官方數字為9,194.00萬人。

2. 實際官方數字為22,366.54億元。

資料來源：按中國行政區劃網（2006）及廣東省統計局（2006:111, 132）計算。

引起不必要的惡性競爭、欠缺周詳規劃和區域協調導致不合理的城市開發和基礎設施發展，以及未有深入認識或未有認真執行平衡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社會和諧的發展策略等。因此，如何促進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的快速發展、協調區內和珠三角地區的平衡成長，成為關係整個廣東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議題，受到省政府的高度關注。

近年廣東的發展不單要顧及內部的協調，對外的協作亦成為重點。自香港和澳門先後回歸，廣東與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合作日益增加和深化，在生產要素流動、跨界基礎設施、經貿和社會各方面的跨境政策上的粵港澳合作，均達到了新的高度；惟在港珠澳大橋和穗深港高速鐵路等跨界合作、融合問題上的一拖再拖，勢必阻礙粵港澳三地和整個地區的進一步發展。聯合港澳兩特區，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出現，同時為粵港澳三地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和更易進入的市場。經過三年的發展，廣東從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得益日漸明顯，在省際合作上打開了更多的窗口，對泛珠三角各省區的投資亦顯著增加，以廣東為中心點的泛珠三角網絡正逐漸形成。廣東的內、外源經濟結構亦產生不少變化。

「十一五」下廣東的發展重點⁶

觀乎廣東過去近30年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十五」時期的發展成就，廣東未來的發展將仍舊擁有優勢，並在時空上具有難以被取代的獨特性。廣東的優勢、獨特性，以及過去發展時所產生和遺留下來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問題，實實在在構成了廣東「十一五」發展規劃的框架和各項工作重點。

廣東的優勢和特點之一，在於其GDP和人均GDP水平已處於國內最高水平之列，並相等於世界上不少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Liang et al., forthcoming）。因此，「十一五」及隨後的發展已不能，亦不應只是盲目追求GDP等數字上的增長，發展目標因而變得溫和及合理化（表四）。反之，社會和經濟發展至

表四：廣東「十一·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

	「十五」時期實際數字		「十一·五」時期預計值		指標屬性
	2005	2001-2005 年均增長	2010	2006-2010 年均增長	
年底常住人口 (百萬人)	91.94	1.20%	97.30	1.14%	預期性
GDP (當年價, 十億)	2236.65	13.20%	3350	9%	預期性
人均GDP (元)	24438	11.40%	34400	8%	預期性
海關進出口總額 (十億美元)	428.00	20.30%	680	10%	預期性
社會消費品零售額 (十億)	788.26	12.50%	1400	12%	預期性
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GDP比例 (%)	1.16 ^②	—	1.8	—	預期性
萬元GDP能耗 (噸標準煤)	0.794	—	0.763	-2.8%	約束性
城鎮化水平 (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徑) (%)	60.68	—	65	—	預期性
非農就業比重 (%)	65.4 ^②	—	72	—	預期性
人口自然增長率 (‰)	7.02	—	6	—	約束性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4770	8.6%	19300	5.5%	預期性
農民人均純收入 (元)	4690	5.1%	6300	6%	預期性

耕地保有量(萬公頃)	326.7@	—	325.7	—	約束性
環境綜合指標(分)	85@	—	86	—	預期性
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	40.2	—	60以上	—	預期性
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	n.a.@	n.a.	10*	—	約束性
城鎮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平方米)	10@	—	12	—	預期性

注：除帶@標記外，2005年實際數字以《廣東統計年鑒2006》為準；

GDP、人均GDP和城鄉居民收入2010年數為2005年價，其他為當年價；

萬元GDP能耗2010年數據為2000年價；

帶*標記的為五年累計數；

主要污染物指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

資料來源：廣東省人民政府（2006:附表1）；廣東省統計局（2006）

目前水平，推動了廣東走向社會和經濟轉型之路，城市化發展水平進一步抬升、工業產業由勞動密集和低技術走向高新技術和資本密集便是當中例子。明顯地，廣東必須改變其發展模式和方向，才能引領整個社會和經濟步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首先是廣東銳意優化產業結構，將三次產業比例調整至2010年的5：50：45的目標；並一方面提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至GDP的18%，同時要求減低每單位能源消耗，較2005年減少13%，提倡環保，建構「綠色廣東」（廣東省人民政府，2006）。

為此，在產業發展上，政府定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必須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方針。前者強調優質、效益、節約和可持續發展，當中主要工作包括提倡農業現代化、包含九大工業在內的工業產業升級，以及發展現代化服務業。後者工作包括大力推進產學研合作、一系列積極政策、強調企業主導的發展和機制，以至於體制的改革。藉此推動軟件產業、信息製造業、信息服務業、新材料產業、生物及醫藥產業等在廣東的成長。

其次，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省政府亦關注到平衡內、外源經濟對全省經濟發展的穩定性。過去一段時間，廣東較為偏向外源型經濟發展，這方向雖然大大推動了廣東經濟的高速增長，亦讓廣東承擔了日漸加大的經濟風險；相反，廣東的內源經濟發展偏弱，使兩者差距持續擴大之餘，社會的不穩定性亦日益增加。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省政府提出要優化和提升外源型經濟。以廣東目前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已不必對所有工業活動和廠家來粵設廠都表態歡迎。省政府提高了來粵投資的門檻，決心引進更高質量和高水平的外資，並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簡單例子之一，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已不再是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生產勝地，省政府要求位於珠三角的該類工廠搬遷至粵東西兩翼和山區等地，廠家需符合指定的環保措施要求，也被鼓勵向高附加值一端發展。對於內源經濟，省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定下了重點政策和措施，決意強化和擴大內源型經濟的發展。策略包括了在政策、法規和市場環境